

今日金评

规定“婚前告知病史” 是对隐私权过度保护的纠偏

10月21日,备受关注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其中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换言之,若伴侣有意隐瞒婚前重大病史,则配偶有权终止夫妻关系。(10月23日 中新社)

对婚前告知病史的立法条款,尽管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但最终支持的占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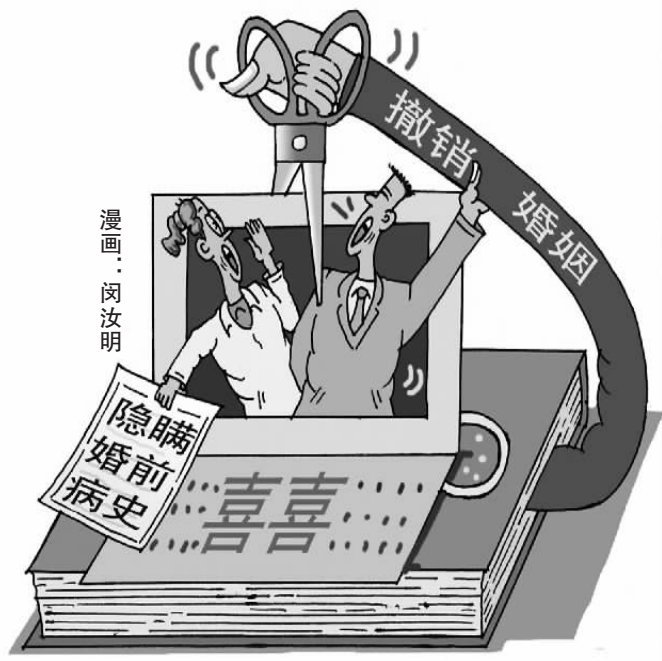
应该认为,立法规定婚前告知病史是正确的。配偶是否如实告知婚前患重大疾病的情况,是影响婚姻稳定和下一代健康的重要因素。婚姻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不同,其背后牵扯到夫妻双方未来共同的生活,以及生育育女的问题。婚姻中隐瞒重大疾病,侵犯的也不仅仅是知情权,甚至可能是生命权。因此,婚前告知重大疾病的病史,应该成为夫妻双方的义务。通过立法,把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显然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

至于所谓隐私权云云,根本不能成为其隐瞒病情的借口。隐私权的保护,是以不触犯他

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但当隐私权与他人权利乃至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权利则需要让位于社会利益,隐私权的保护也要让位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当隐私权直接威胁到他人的利益和生命健康时,隐私权就会受限。从权利排序的角度看,健康权和生命权大大高于隐私权。

2017年有媒体报道,南通市一对夫妻当初在办理结婚登记前,共同在当地婚检机构进行了婚前检查,各项检查均显示不存在不宜结婚的健康状况。婚后不久,妻子生了个孩子,可是这时男子发现妻子竟然早就患有艾滋病,一怒之下,他将婚检机构告上法庭,并索赔10万元彩礼损失和2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但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那这个男人、这个家庭、这个孩子怎么办?

可见,一定要打破“隐私权至上”的错误观念,纠正把隐私权置于健康权、生命权之上认识和实践,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应该修订。隐私权的保护第一不能损害公共利益,第二也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不应该为了一个公民的隐私权,造成恶劣的社会后果。 殷国安



热点追评

博士小学教师 要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年薪本科生26万元以上,研究生28万元以上,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元,优秀毕业生奖励3-8万元……今年9月,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发布消息称,区公办中小学面向海内外2020届应届毕业生招聘教师约400人。因给出近30万元年薪,该招聘信息引起热议。最新消息称,此次秋招共吸引海内外超3.5万名应届毕业生报考,最终来自全球62所院校的491人入围体检,其中研究生学历423人,占比86.2%。(10月23日 澎湃新闻)

深圳龙华区发布的这则招聘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在于高薪,还在于高学历。对此,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大材小用。在有的人看来,北大清华一年毕业学生就那么多,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结果成了中小学教师,这不是人才浪费又是什么?一方面大量需要人才,另一方面又大量存在人才浪费现象,这是不争事实。但也要防止简单化、标签化。

判断“博士小学教师”是否人才浪费、大材小用,起码要有两个视野。一是历史视野。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有过当中小学教师的经历。比

如钱穆先生被尊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不仅曾当过中学教师,也曾当过小学教师。二是世界视野。芬兰以教育著称,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高质量的教师。芬兰的教师门槛之高,就连世界五百强也要望其项背,哪怕是做一个小学教师,也要具有研究生学历。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否尊师重教,不能只听口号。评价一个行业的地位,有一个重要标尺,那就是有没有吸引到最优秀的人。连最优秀的人才都不能吸引到,又凭什么说这个行业重要。教育是希望工程,关系和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而现在,教师要有一潭水,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教出优秀的人。尤其是基础教育,更需要第一流的优秀人才。有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中小学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比例仅为3.10%,普通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仅为9.82%。如果教育不能吸引到人才,尤其是优秀人才,又如何承担美好向往?可以预计,会有越来越多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博士小学教师”也终会习以为常。 毛建国

百姓话语

假如贾宝玉 学会了“恋爱话术软件”

近日,多款“恋爱话术软件”引发网友热议。这些软件号称只要输入女生说的话,就可“通过”“大数据”筛选出最合适的回答,有助于“不会说话”的男性网友获得女生的青睐。(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

单纯理解,话术是说话的艺术,但如果加以曲解为一种狡辩谎言欺骗的能耐,那这样的话术就是骗术。

爱情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至上感情,但是,任何通过欺骗得来的爱情,终究是一张画饼。即便有幸生米做成熟饭,也一定是一锅夹生饭,让你一辈子生活在自己制造的骗术阴影当中。

说起话术,想起了《红楼梦》。

恐怕少有人比贾宝玉更多关系如此密切的女人,也没有人比贾宝玉更需要一款话术软件了吧?然而贾宝玉并没有掌握哪一种恋爱话术,也没有请哪一位“话术大师”或者“话术导

师”来教他某一种顶尖的话术,可喜的是贾宝玉并没有变成话术的“差生”,而是实实在在的顶尖恋爱高手。为什么?出之于心,发之于言,一枝一叶总关情,任何一位在其身边的女性,都有其本真的面目,也有其本真的思想。假如贾宝玉也来一套这样的恋爱软件,那还不得闹出天大的笑话来?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你以为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都是傻子?

因此说,恋爱话术实则无术,假如硬要说其有术的话,术就是纯真、真爱,如同《诗经》一样,发乎于情,言之于口,任何虚假的粘贴复制出来的软件中的爱情表白,你不觉得是一种对于爱情的亵渎吗?

“不见面”的恋爱聊天在所难免,情感交流也未必一定“面对面”,然而就恋爱中的语言交流而言,却一定是“心对心”的交流。靠恋爱软件的粘贴复制话术来谈恋爱,最终换来的一定是一种虚情假意,因为对方也可能正在使用同一款软件在对你粘贴复制。 李振忠

不吐不快

不想“社区行政化” 先得“职责明确化”

半月谈记者走访多个城市社区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工作负担沉重,特别是上级甩下来干不完的任务和死灰复燃的奇葩证明,让社区干部心力交瘁。他们反映,他们现在是“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遇最奇葩的事”。(2019年第19期《半月谈》)

社区居委会不是行政部门,而是居民的自治组织。但从记者调查看,社区工作人员干了大量行政工作——民政、计生、交通、社保、劳保等本该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几乎都转嫁到社区身上,造成社区工作人员“14个人干近百项活”,工资待遇却不及街道办干部一半。

虽然是在“放管服”改革中,上级部门放权是很重要的一项改革内容,但是街道办放权必须把握好尺度,不能把本该自己干的工作甩给下级组织;不能把本该自己承担的行政成本变成社区的负债;不能让某些政策落地和公共服务打折扣,因为社区工作人员执行力有限。

要治理社区行政化倾向,必须进一步明确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两者的职能与职责,让行政事项归街道办,自治事项归社区居委会。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要想把街道办与社区的职责彻底切割不太可能,因为街道办落实某些行政任务离不开社区居委会的协助。

只有在法律法规中详细界定街道办职责以及每个岗位具体责任,禁止“行政下移”,否则以失职失责论处,才能约束街道办转嫁责任的权力。同时,还要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职责以及每个工作岗位责任,禁止社区随意承接承接行政工作任务,才能减轻工作压力。

虽然《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了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但还不够详细具体,需要完善该法律,或者针对社区行政化等现实问题制定实施细则,以严格执法保护社区的权益。 张海英



三江快评
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投稿邮箱:

jinbaopinlun2012@126.com